



古代辩术精粹

上册

● 牛鸿恩 / 主编

● 延边大学出版社

H119
2

95337

智慧的源泉 语言的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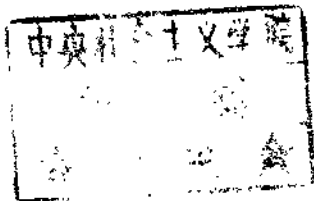
古代辩术精粹

DZ49/05 (上)

牛鸿恩 邱少华 谭宝善 选译
秦松鹤 李 丹



200072367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主 编

牛鸿恩

副主编

张铖彬 邵天声

撰写分工

邱少华

《论语》《孟子》《庄子》《列子》

《荀子》《商君书》宋玉

谭宝善

《墨子》《晏子春秋》《公孙龙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

秦松鹤

《史记》《新序》《说苑》《汉书》

李 丹

《国语》

牛鸿恩

《左传》《战国策》《管子》《礼记》

《尹文子》《尸子》等

凡 例

一、本书所录辞令，基本上起于春秋，止于汉武帝。

二、凡属说谏、训诫、论辩、外交与日常应对的优秀辞令，足以代表古人谈辩水平和启迪今人心智，提高言谈技巧者，都在选录之列。

三、各篇辞令，原多无篇题，今皆自拟。对各篇辞令均作简要说明，交代有关背景、情节，评析其技巧、特色，以求有益于读者阅读借鉴。

四、译文既求忠实于原作，又求明达流畅，尽力传达原作风神。

五、原文中的生僻字，即在该字之后注音。古今字、通假字，即注明于该字之后，如“说（悦）”、“从（纵）”、“锡（赐）”、“趣（促）”，以省读者翻检之劳，俾便于阅读。原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专主一本。如有改字，必说明理由。

六、凡通过译文可以明了的生词难句，不再作注。人名、地名、史实、典章制度等，一般均作注释，以便深入理解原

作。

七、所录辞令近四百章，分为说谏（又分正说直谏、巧说谲谏）、训诫、应答、对问、论辩、讥讽与援古证今、寓言明理八类。读者既可以通读全书，亦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选读有关类别的辞令。

八、有的著作成书时代不明，甚至真伪莫辨，每一类辞令大致按其著作时代的先后排列，故《管子》、《晏子》置于《孟子》、《庄子》之后。有的以类相从，如《列子》与《庄子》、《尹文子》与《公孙龙子》并列。每部书的辞令分列于各类，各类中的排列先后仍依原书顺序。

九、作附录二种。目录依类分书排列，倘读者欲研究某人（如子产、孟子、苏秦）的辞令，则可用“人名索引”检索。

韩序

早在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受虽身为农民但却极喜欢读书的父亲的影响，时常读一些《古文观止》、《古文释义》，以及《左传句解》之类的书。对于其中的含义，当时虽然似懂非懂；但对它的文章却总觉得非常带劲，有些篇甚至能背。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课堂上老师讲了中国文学史，自己在课下又读了《左传》、《国策》、《史记》等书，这时才对它们的“思想性”、“文学性”等有了虽然肤浅但却比较全面的认识。例如讲课老师和文学史教材在称道《左传》高超艺术性的时候，都突出地提到了它在描写行人辞令方面的成就，使我们对春秋时代种种复杂而精彩的“内交”和“外交”活动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使我们一方面既感慨古人说话的天分之高，一方面又敬佩古人为了练习说话所下的工夫之大。例如《论语》曾记载了郑国宰相子产准备一篇外交文件的过程：“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在说到孔子杰出弟子的分类时，也醒目地标出了“言语”一项。可知古时候的学校里曾设有专门训练说话

的科目，而社会职业的三百六十行中也有说话专业户这一行。

后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也随着对古书的越读越多，便又逐渐地明白了一些其他的道理，明白了古书上所写的那些事情原来有许多是只能读而不能完全相信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家笔下的“历史”；“真实”，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绝对的“真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更何况古代的书写条件艰难，记事只能是大概其而已。一封国书，一份战表，一道奏折，也许有实物让历史家看到，可能是“实录”；战场上两人追杀中的呼喊，密室中几人阴谋时的低语，卧榻上男女之间的隐私，历史家也能娓娓写来，这又有什么凭据呢？清代周亮工曾怀疑《史记》所写的项羽的《垓下歌》，他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为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管锥编》引）说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那四句诗一定是司马迁代为撰写，有点武断，但周亮工能看出《史记》中有许多司马迁个人的发挥、创造，则是确定不疑的。《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绋，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轹我，击之，必大捷焉。’”清代顾栋高对此作诗说：“文公出绋柩如牛，篝火狐鸣先轸谋。假托先君行大事，左公神笔乱人眸。”（《春秋大事表》）妙哉，我觉得只有这样读先秦两汉的古书，才算是读出了点味来。

按学术界通常的说法，魏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期，在此以前的先秦两汉，文学是与历史、哲学等等紧密结合的。在那个时代，只有最伟大、最富有文学天才的人物，才有资格出任史官，才有资格担当撰写国史的重任。试想战国时代

的左丘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东汉时期的班固，哪一位不是这个样子呢？他们面对的是一堆非常杂乱，非常粗糙，更有些是非常简单，甚至是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传说中的东西。他们就是在这些杂乱、矛盾、众说纷纭的粗糙东西的基础上，经过他们细致的“考查”、“研究”，与设身处地的发挥想象，最后按照他们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撰写出一部体大思精的“一家之言”。其思想是历史家的，其艺术成就也是历史家的。以他们当时的眼光看来，历史就应该是写成这个样子，而不应该写成“断烂朝报”，或者是写成陈年的流水簿子。过去的“国书”“战表”行人辞令，有的当时还在，这就可以拿过来按照需要加以剪裁用上去了；如果历史家手头没有这种现成的东西，而按照写人叙事的需要又恰恰应该有，没有办法，那就只好自己挥笔替它来一段了。这就是前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应该说，越是时代早的“历史”，这样的事情也就越多。《史记》比《汉书》多，《左传》比《史记》更是应该多得不可胜数。至于《国语》、《国策》，一本是教育贵族子弟的说教书，一本是老纵横家培养小纵横家的教材，从性质上就不是历史，其夸张杜撰更不待言了。

同时我们还要明白，古人当时的说话，其实也并不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左传》、《国策》所写的那种说法。关于这点，鲁迅早在《门外文谈》中就说过：“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因此，古人当时即使完全说过那个意思，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左传》、《国策》当中的那些话，也完全是经过历史家重新概括、重新熔铸出来的。

综合以上诸点，我们可以大致明白，先秦两汉古书中所记载的前人辞令之所以能如此之高，如此之美，如此之灿烂辉煌，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贵族、学子，的确从小都受有这方面的训练，有的人还专门以此为职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看起来五花八门，各具个性特征的种种辞令，其实都是由一个在当时独领风骚的大文学家如左丘明、司马迁等坐在屋子里细心揣摩，逐个“笔补造化”为其代言地撰写出来的。因此我们大可以不必对古人过于盲目崇拜，和对于后代的人们妄加菲薄。

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阶层，某一种行业，乃至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确是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分的。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尤其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除了在思想内容、审美情趣等方面应该给读者以积极影响外，在语言方面它也应该成为读者学习的典范，应该在提高人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的确又应该感谢《左传》、《国语》、《国策》、《史记》、《论语》、《孟子》、《庄子》等这些先秦两汉的杰出的文学著作，以及创造它们的那些杰出的语言大师们，是他们的这些辉煌著作两千多年来一直哺育、影响着我国的广大人民，他们著作中的那些生动活泼、形象优美的语言至今仍大量的活在我国千百万人民的口头和书面上。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从另一个方面，则应该看到我国有十二亿人口，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即使按那些能看书，也有兴趣看书的人们来说，他们当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只是停留在看武侠、看通俗小说的水平上；即以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而言，也只有那些少数学文的才

接触过一些这种古代名著的片断，这就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的迅速发展太不协调了。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正在经济上摆脱贫困，正在走向小康的泱泱大国的若干亿劳动人民，他们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总是停留在低下、贫乏的水平上；我们也不能想象，我们的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技术上去了，只是由于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以至于细得连我们的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们也语言干瘪，文化知识贫乏。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样的事实却又的确严重地存在着，这就是留给我们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一项繁重而又迫切的任务了。

也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牛鸿恩同志将我国先秦和秦汉时期的精言妙语搜集起来，主编了一本《古代辩术精萃》。这些古代杰出的“谈辩辞令”片断，是从《左传》、《国语》、《国策》、《孟子》、《庄子》、《史记》等二十多部名著中挑选出来的，总共近四百条，分作了“说谏”、“训诫”、“应答”、“对问”、“论辩”等八个门类。这就给那些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专门翻阅古书，而又想了解一些古人的谈辩艺术，并想从中学学习一些说话技巧的人们大大地提供了方便。它可以供我们从头到尾地细读，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古人的谈辩艺术，可以使我们从中悟出一些道理，从而使我们的思维谈吐有所提高；它也可以供我们在准备讲话或写文章时为了某种需要而有针对性地去查，以增强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论辩力和说服力。它可以作为一般青年的阅读流览之用，更可以给从事公关工作，从事人际交往工作的专门人才们提供一个“袖珍的”良师益友。一个人的说话所以有分量，所以能够打动人，当然首先在于他所说的是真理，是大家所特别关心、特别想听的事情，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事实、道理相等，或是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谁的话更能打动人，这就取决于说话人的技巧了。有时说话也像下围棋，同样是下这几颗子，就因为先下哪一颗的顺序不同，结果就可以导致全局的成功或失败。

《古代辩术精萃》是一本广闻益智的好书，是作者们献给社会的一份虽然并不豪华巨大，但却相当丰厚、相当实在的礼物。我作为第一个读者，谨写以上小文以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1993年10月4日

自序

什么是“辞令”，有些读者或许感到有点生疏。但是只要一提“外交辞令”，大概就能心知其意了。“辞令”又写作“词令”，古代还常写作“辞命”，它的用场，不仅限于外交。“辞令”一词，初见於《左传》，有时候还称“文辞”或“辞”，例如：“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又善为辞令。”（《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它们的含义其实是相同的。我国的大小辞书，对“辞令”都有解释，一般释为“应对的言辞”，相比之下，《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最为明晰：“交际场合应对得宜的话语。”其他如：“言语优美也。”（《中华大字典》）说得也不错。“文辞”，是“言词动听的辞令”（《春秋左传词典》、《汉语大词典》）。“令”的本意是命令，引而申之则为告语（yù 玉）、告诉（《诗经·东方未明》毛传：“令，告也”）。“命”同样有告诉的意思，所以辞令又称做“辞命”（在甲骨文、金文中命、令是同一个字）。

由此可知，所谓“辞令”，就是优美动听而又得宜的交际语言，它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交际场合的酬答应付。就今天而言，外交、谈判、日常应对、公关、演讲、论辩以及相应的写作，无不属于辞令的范围。

我国辞令的辉煌发展，在春秋、战国及楚汉时期，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

春秋时代是一个异常重视礼仪的时代。诸侯之间要相互聘问，使臣对于进退登降之节一丝不苟，言谈举止无不讲究贵族的体面和风度。“大概基于天性罢，从原始的野蛮人到高级的文化人，无时无刻不喜欢装饰。在中国，春秋时人恐怕是最考究的了。……贵族们……都要维持一种标准风度——风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此种的生活方式，其特征之一，便是装饰。装饰得当，就合乎那标准——就是礼。”（季镇淮《来之文录·“文”义探原》）“言，身之文也。”言谈，是对自身的“装饰”，因而那时代要专门培养应对的本领，“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明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二》）。同时，这时的人特别重视辞令的准备和写作，《左传》记载：“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谿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襄公三十一年）由此也可以看出辞令的作用。

《左传》、《国语》中的辞令，特别是《左传》中的辞令，那样温文尔雅，容雍大度，谦恭有礼，委婉含蓄，充满彬彬

君子之风，具有那样高超的语言艺术，就根源于那时的人重礼、重体面、重辞令。本书所录《弦高犒师》、《韩厥执紫马前》、《晏婴请继室于晋》、《郑襄公对楚庄王》等篇，可以作为一种辞令的代表，它们的“文而有礼”，真是无以复加了。

春秋，又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兵连祸接，无岁不有。大国要问罪，小国要自卫，国际间的交涉事件，也是接连不断。要交涉，就离不开辞令，因此说“会盟征伐交错，而唯辞命是赖”（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为政》）。在这种情况下，也就“磨练了口舌，养成了‘辞命’专家，产生了这时代的‘辞命’文学”（李镇淮，同上）。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之辞，与上述辞令的“文而有礼”也不同。虽然字面上仍旧“文而有礼”，但是有一些就需要巧言周旋，旁敲侧击，因而婉而多讽，有话外之音，像《阴飴甥对秦伯》、《展喜退齐师》、《吴趯由犒楚师》。另有一些则是严婉并用，字挟风霜，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力挫对方的威风，如《郑子家告赵宣子》、《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宾媚人不辱使命》。子产的一些辞令如《戒服献捷》、《坏晋馆垣》、《对晋人征朝》等也常常是以柔济刚，据理力争，关键处寸步不让，态度十分强硬，因而始终能做到维护郑国的利益和尊严。

《左传》的辞令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中左》）“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不淫。”（《史通·言语》）梁启超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要籍解题及其

读法》)郭预衡先生更明确说:“《左传》文章的辞采之美,是和子产这流人物之善于辞令分不开的。”(《中国散文史》上册)。

《国语》辞令的成就,总的来看比不上《左传》,但也不容忽视。有些辞令,与《左传》的文字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如《重耳应对楚成王》、《阎没叔宽谏魏献子》;有一些文字颇有不同,而难分上下,如《蔡声子巧言归伍举》、《子服惠伯见韩宣子》;更有一些辞令,是《左传》中没有的,如《周襄王拒晋文公请隧》、《郕公谏厉王弭谤》、《伍举论台美而楚殆》、《叔向贺韩宣子贫》、《诸稽郢行成于吴》等,《晋悼公入国训大夫》一篇《左传》中虽然有,却过分简略。这些都是相当精到的辞令,足以补《左传》的不足。

《论语》、《晏子春秋》所载人、事也属于春秋。《论语》虽然常常是三言五语的语录,但是孔门重文,师弟子问答之际,颇多意味隽永、饶有情趣的言辞。所以有人赞誉《论语》中有“极顶上乘的作品”,“可比《诗经》,而境界尤高”(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页53、57)。《晏子春秋》是齐相晏婴的言行录。晏子是一位“习辞”者,极善说谏应对,所以《晏子》中有不少机智巧妙的辞令,像传诵不衰的两篇《晏子使楚》,置之最佳辞令之列,是毫无愧色的。

由于客观情势的需要,社会习俗的推动,春秋人的心力、智慧钟于辞令。就“文而有礼”而言,春秋辞令可以说是后人“不可及的范本”。“后此亦殆未有其比”,这话并没有夸张。

二

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数张而扬历，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又说：诸子之学“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这段话有三个要点：（一）战国是纵横之学盛行的时代；（二）纵横家的游说辞是春秋辞令的进一步发展；（三）战国诸子之文，都带有纵横家游说辞的色彩。章氏的论断是有见地的。

活动于春秋政坛的，是世袭贵族——卿大夫，到战国时代，新兴的士阶层则扮演了政治舞台的主角。其中最活跃的是纵横之士。他们的职业和长技就是游说，而且活动能量极大，能够“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刘向《战国策书录》）。因此他们地位显荣，举足轻重，各国统治者对他们刮目相看。这是中国历史上“游说家鼓其簧舌唯一得意的时代”（季镇淮，同上）。这个时代，社会状况、风气，都与春秋时代不同了，因而游说辞的风格，也就与春秋时的辞令显然有别。

最能体现战国辞令风格的，首推《战国策》中的游说辞。纵横驰骋，畅所欲言，奋迅凌厉，气势夺人，富有鼓动性和冲击力，是《国策》说辞的突出特色。《苏秦说齐王合从》、《张仪说韩王连横》、《唐且不辱使命》、《虞卿斥楼缓》、《鲁仲连斥辛垣衍》、《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庄辛论幸臣》等，就是这样的辞令。在这里，礼法信义不见了，雍容委婉不见了，

个人的体面不讲了（如貂勃以犬自比），代之而起的，是铺张扬厉的陈述，纵横恣肆的气势和摄魂夺魄的雄辩。为了增强说谏的效果，《国策》中的说辞不重字句的精严，而重章法笔法的奇特变化，所以说《左传》善用“密”，而《国策》善用“疏”（刘熙载《艺概·文概》）。

施智用巧，迂回曲折，出奇兵而操胜算，是纵横之士游说的拿手好戏，也是《国策》说辞的另一个突出特色。《苏子重甘茂于齐》、《齐人谏靖郭君城薛》、《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张翠求救于秦》、《陈轸对秦王问》、《齐人讥田骈》、《范雎说秦王》、《淳于髡讽齐王救薛》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巧说谏诤方面，《国策》中的说辞，雄踞战国诸书之冠，它是一座智谋计策的府库，是“巧”“谏”技巧的宝藏，“后此亦殆未有其比”。通过说谏，倾人之国，夺人之城，常为人所诟病，平心而论，这是各为其主，此容当别论。但是，不择手段，排挤政敌者有之；阴险毒辣，谗害良善者亦有之；排起国际争端，从中渔利者又有之。此皆前人所谓“坏人心术”者，乃当去之“毒”。然而倘善用其书，则启人心智、益人口辩者，又何可胜道也哉！苏洵称道触龙、甘罗、鲁仲连、苏秦、范雎等人的“机智勇辩”，他“取苏、张之术，不取其心”（《谏论》），乃是善读《国策》的一例。

辞令卓著，可与《战国策》抗衡的是《孟子》。孟子生当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时代，他积极宣扬、维护儒家的主张，批判各家各派，因此得了“好辩”的名声。他胸怀大志，以王者之师自居，自称“说大人则藐之”，为人通达机敏，又吸收了纵横家的谈辩技巧，所以特别长于说谏。他善于掌握对方的心理，因势利导，抑扬擒纵，随其所欲，又能巧设机关，